犁頭與刀劍——前尼西亞教會的戰爭倫理觀

陳禮裕
新加坡三一神學院
Trinity Theological College, Singapore

一　引言

認為奧古斯丁（Augustine）以前的早期教父對戰爭一事主要採取非戰主義，乃今日學術界常見的觀點。[1] 許多近代學者聲稱早期的基督教會不僅反對偶像敬拜與皇帝崇拜，同時也反對任何形式的積極軍事參與。此文章所提及的軍事參與指的是投身軍旅並以參軍為主要謀生的途徑。培登（Roland Bainton）觀察到自新約時代末至主後170至180年間，「沒有任何證據顯示基督徒參軍。軍事服役的問題顯然地在當時並沒有引起爭議。」[2] 較早之前，

---

[1] 本文的初稿曾在香港建道神學院「戰爭與和平——國際學術研討會：宗教視角」（2015年10月30日）上發表，謹此多謝與會者的寶貴意見，尤其是評論員郭鴻標教授及其他匿名的同儕評估員。

[2] Roland Herbert Bainton, *Christian Attitudes toward War and Peace: A Historical Survey and Critical Re-Evaluation* (Nashville: Abingdon Press, 1982), 67-68. 奇爾德雷斯（James F. Childress）基本上也贊同培登的發現。參James F. Childress, "Moral Discourse About War in the Early Church," *Journal of Religious Ethics* 12:1 (1984):2-3.。

卡多斯（C. J. Cadoux）也作出相似的結論，指出除了新約中哥尼流及保羅在腓立比為之施洗的獄卒的例子外，「沒有直接或可靠的證據顯示主後170年以前，有任何一個基督徒士兵。」[3] 培登認為，早期基督教會的非戰時代大約始於這段期間，直至君士坦丁為止；他如此總結：「在這期間，就我們所知的基督徒作者中，沒有一個認可基督徒投身戰場。」[4] 戈里（Gorry）也留意到這個傳統的看法，即「在前尼西亞時代，教會基本上是非戰的，只有到君士坦丁歸信後，教會纔逐漸趨於軍事化。」[5] 更近期，尤達（Yoder）對早期基督徒的非戰主義也達致相同的結論，且將此結論歸因於他們對殺戮的全然和絕對的拒絕。[6]

這樣說來，前幾個世紀的基督教實質上是不是一場非戰／和平運動呢？於本文中，我們將根據早期教父的作品，審查他們對戰爭的態度和做法的歷史憑據，並建議有根據顯示有部分教會並不是非戰主義者，或充其量只是類非戰（quasi-pacifist）或半非戰主義（semi-pacifist）而已。主要的考慮因素是他們對基督徒從軍的態度。我們首先要指出，有基督教外的文獻就記錄了基督徒參軍的證據。主後174年，當羅馬皇帝奧勒留（Emperor Marcus Aurelius）領軍遠征時，他的軍隊因為水供短缺而險遭自身的乾渴與迫近的敵人的殲毀，有記載當時由基督徒所組成的第十二軍團的兵士向他們的神禱告求助。接踵而來的就是一場大雷雨，不但為羅馬軍帶來喘息的機會，也驅走了敵對的蠻夷，並同時為該軍團換來一個稱號：「雷電軍團」（Fulminata）。[7] 因這記載，儘管培登堅持非戰主義，也不得不認為這是顯示羅馬軍隊中確實有基督徒參與的「最不可或缺且持續的傳統」。[8] 因此，

---

[3] Cecil John Cadoux, *The Early Christian Attitude to War: A Contribution to the History of Christian Ethics*, The Christian Revolution Series 3 (London: Headley Bros., 1919), 97.

[4] Bainton, *Christian Attitudes toward War and Peace*, 66.

[5] Jonathan Gorry, "Swords into Ploughshares? Ante-Nicene Christianity and the Ethics of Political Violence," *Religion Compass* 5:12 (2011): 763-64..

[6] John Howard Yoder, *Christian Attitudes to War, Peace, and Revolution*, ed. T. J. Koontz and A. Alexis-Baker (Grand Rapids, MI: BrazosPress, 2009), 45.

[7] Michael Ott, "Thundering Legion," in *Catholic Encyclopedia* (New York: Robert Appleton Company, 1912).

[8] Bainton, *Christian Attitudes toward War and Peace*, 70. 然而，德賴忽（John Driver）則認這個故事難以採信，因為在這以前，第十二軍團已經被稱 Fulminata ，或「雷電軍團」，故此事件很可能是 了給以基督徒一個正面的形象而造出的。參John Driver, *How Christians Made Peace with War : Early Christian Understandings of War*, Peace and Justice Series 2 (Scottdale, PA: Herald Press, 1988), 37。

是有證據表明了至少在奧勒留麾下曾經有一支由基督徒組成的軍團參與軍事征伐。值得注意的是，這段期間並還沒有涉及後來所謂的正義之戰的觀念，因為當時的基督教並不是國教，基督徒普遍上還沒有發展出一套頗完整的參軍神學。這有待後來的奧古斯丁於其作品中探討出正義戰爭的理論。

至於為何在主後170年以前，似乎沒有基督徒參軍的記錄，賴恩（Ryan）將此原因追溯至那段時期羅馬帝國的處境。主後170年以前，羅馬皇帝能以牢固地控制他們的邊境，很大程度得歸功於強大邊陲軍團的助力，也因此為帝國境內帶來相對持久的和平與穩定，不需要屬於少數羣體的基督徒加入軍隊的行列。[9] 但是，當基督徒的人數日益增長時，信徒的信念與社會責任之間就形成一種張力。進入第三世紀，當羅馬帝國逐漸衰微時，其存亡就成了整個帝國所關注的問題，而基督徒也開始發現他們必須以不同的回應方式，為其生存付出積極的努力。這正是引發當代基督徒對參軍合法性的問題的主要推動力。[10] 魯瑟（Ruyter）也得出同樣的結論；他描述當曾經為羅馬帝國帶來兩個世紀穩定繁榮的羅馬治世（Pax Romana）開始沒落時，基督徒對戰爭倫理的立場必然會改變。[11]

只是，我們最初所問的問題依然存在。早期教會對於服役軍中的普遍態度是甚麼？赫爾格蘭（Helgeland）注意到儘管早期教父們在論及基督徒的生活與信仰時，內容包羅萬象，但是關於當時代基督徒參軍的詳細討論其實卻寥寥無幾。[12] 他將這現象歸因於此一舉動的缺乏爭議性，致使教父評論的疏散。在主要的教父中，最明確的聲明來自特土良（Tertullian）與俄利根（Origen），亞歷山大的革利免（Clement of Alexandria）、希玻律陀（Hippolytus）及拉克坦提烏斯（Lactantius）則只是簡要述及。與此同時，

---

[9] E. A. Ryan, "The Rejection of Military Service by the Early Christians," *Theological Studies* 13:1 (1952): 9-10.

[10] Ryan, "The Rejection of Military Service by the Early Christians," 14-15.

[11] Knut Willem Ruyter, "Pacifism and Military Service in the Early Church," *Cross Currents* 32:1 (1982): 56.

[12] John Helgeland, "Christians and the Roman Army A.D. 173-337," *Church History: Studies in Christianity and Culture* 43:2 (1974): 150.

我們也必須先承認，如果沒有任何具體參考指向反對軍隊的徵募，卻不能就以此作為對非戰主義的正面肯定，一如一些現代評論者所傾向於認為的。[13] 有了這樣的認識，我們就從兩位最主要的評論者——特土良與俄利根——開始，來看看教父關於這方面的作品。

二　特土良

眾教父對此課題的論述，以特土良最為不遺餘力，撰寫的著作遠超其他人。然而到了後期，他對軍事服役一事的立場卻似乎有所改變。在他早期的著作裏，他對於基督徒參軍似乎並沒有太大的反對。事實上，他甚至以基督徒從軍為例，駁斥當時一些批判者指稱基督徒漠視帝國職務的控訴。當代基督徒被他們指控為對羅馬帝國漠不關心，忽視身為羅馬公民的職責。為此，在他的《護教篇》（*Apology*）中，特土良指出基督徒並非如所控訴一般，而是確實有為帝國的福祉禱告，其中包括為其「軍人勇敢」（brave armies）禱告：

> 因為我們為了我們君王的安全，向永恆的、真正的、活生生的神獻祭，就是這些君王也應首先尋求祂的恩惠。……我們不斷地為我們的皇帝祈禱。我們祈求君王長壽，帝國安定，求祂保佑皇室，*使軍人勇敢*，元老忠誠，民眾有德，普世安寧，事無巨細，均如皇上之心。[14]（斜體另加）

至於有關基督徒似乎與當代社會保持距離並拒絕參與其間事務的控訴，他也加以駁斥，表示基督徒乃與帝國的其他公民團結一致，甚至並肩作戰的：

---

[13] Helgeland, "Christians and the Roman Army A.D. 173-337,"150.

[14] 德爾圖良著，塗世華譯：《護教篇》（上海：三聯，2007），第三十章，頁57～58。原著譯自Tertullian, "*Apology*," in *Ante-Nicene Fathers,* vol. 3, ed. P. Schaff (Peabody, MA: Henrickson Publishers, 1986), Chapter 30。

> （有人）……指摘我們無益於人生大事。對於生活在你們之中，吃同樣的飯，穿同樣的衣，習俗相同，具有相同的生存需要的人來說，天下哪有這種事呢？……（我們）與你們一起寄居在世，既不回避廣場、屠宰場、浴池、貨攤、作坊，也不回避旅館、周日市場，以及其他交易場所。我們與你們一起航行，*一起打仗*，一起耕作；[15]（斜體另加）

所以看起來，對特土良而言，軍人這門行業本身並非不合理法，或不合基督教信仰的。但這並不表示他就認同所有就業活動，因他繼而就在文中列出一系列他認為基督徒不應參與的活動，特別是那些包含了參與異教宗教儀式的活動。[16]

然而，大約十年後，特土良的神學在他加入孟他努派之後偏向保守；在基督徒參軍的可接受度上，顯然也改變了念頭。在他的《論偶像崇拜》（*On Idolatry*）中，他就這樣論及基督徒服兵役的問題：

> 現在的問題在這一點上，一個信徒是否可以從軍，是否可以接納軍人入教，甚至那些不必參與獻祭和執行死刑的下級軍官，是否可以入教。在天上與人間的誓約之間，在基督的軍旗與魔鬼的軍旗之間，在光明世界與黑暗世界之間，沒有共同點。一個靈魂不能屬於兩個主人——上帝和該撒。[17]

這裏，我們看到特土良一個看似迴異的立場，到一個地步，如今他視參與兵役等如同服事魔鬼。這立場的轉換或許反映了孟他努主義所倡導的徹底與世界分離的教義。仔細閱讀的話，我們卻不難發現他對軍事參與的非難，乃因為他關注的，是其中所包含的偶像崇拜，而非出於任何戰爭的倫

---

[15] 德爾圖良：《護教篇》，第四十二章，頁74。原著譯自Tertullian, "*Apology*," Chapter 42。亨特（D. G. Hunter）在討論《論偶像崇拜》時解釋特爾圖良持非暴力立場，但似乎忽略了大多數學者都同意這是一部在特氏加入了孟他努派之後的作品，所以自然趨向保守。D. G. Hunter, "A Decade of Research on Early Christians and Military Service," *Religious Studies Review* 18:2 (1992) 88.

[16] 德爾圖良：《護教篇》，第四十二章，頁74。原著譯自Tertullian, "*De Corona*," in *Ante-Nicene Fathers,* vol 3。

[17] 德爾圖良：《護教篇》，〈論偶像崇拜〉第十九章，頁117。原著譯自Tertullian, "*On Idolatry*," in *Ante-Nicene Fathers,* vol 3, Chapter 19。

理，即是說，不是出於一種非戰主義。特土良注意到當時效忠軍隊就包含了獻祭給該撒。正如赫爾格蘭所提出的，當時稱為「Sacramentum」的軍隊誓約就要求軍人與皇帝聯係起來。[18] 另外，特土良文中所指的「魔鬼的軍旗」乃是安置於每個軍營中的戰地軍標，而每個軍旗都被視為灌滿了宗教力量，即「守護力量（numen），那由諸神傳遞至皇帝與全軍隊的力量。」[19] 儘管如此，卡多斯還是辯稱特土良的反對不應只被視為是基於偶像崇拜的危險，同時也是因為他對各種殺戮的反對。[20] 然而，在上面引述的段落中，特土良卻是把他的反對建基於該撒崇拜上。就如奧爾尼斯（Hornus）所說的，特土良似乎允許基督徒參與國事，甚至在必要的情況下承擔官方職務，為羅馬帝國效力，只是他們必須拒絕參與任何偶像崇拜。[21] 從這個角度來看的話，特土良反對基督徒從軍或參戰的主要理由乃在於當時當一個軍人誓言效忠皇帝時，就必然免不了參與其中偶像崇拜的做法了。

除了其帶來偶像崇拜的可能性之外，特土良並非堅決反對軍中服役的這一立場，在他的另一著作《論花環》（*De Corona*）中也可看到。文中述及一名基督徒士兵因為月桂花環與異教的關聯而決定不將它戴上，以致在他的同僚中顯得特別的事件（第一章）。當被問及他的決定時，這個士兵回答說：「我是一個基督徒」（第一章），結果他馬上被剝去軍銜，且鋃鐺入獄。特土良注意到這基督徒士兵拒絕的主要原因，乃在於與士兵們的月桂花環相關聯的意義：

> 這種月桂枝的東西，原是獻給阿波羅（Apollo）或酒神（Bacchus）的：前者是作為弓箭之神，後者是作為勝利之神。……在分施賞賜時，按規定要戴月桂花環。所以你看，拜偶像不會沒有報酬的，現在為了一點錢出賣基督，就像猶大為了一點銀子出賣基督一樣。[22]

---

[18] Helgeland, "Christians and the Roman Army A.D. 173-337," 151.

[19] Helgeland, "Christians and the Roman Army A.D. 173-337," 152.

[20] Cadoux, *The Early Christian Attitude to War*, 114-15.

[21] Jean-Michel Hornus, *It Is Not Lawful for Me to Fight : Early Christian Attitudes toward War, Violence, and the State*, Rev. ed., A Christian Peace Shelf Selection (Scottdale, PA: Herald Press, 1980), 97.

[22] 德爾圖良：《護教篇》，〈論花環〉第十二章，頁170。原著譯自Tertullian, "*De Corona,*" in *Ante-Nicene Fathers*, vol 3, Chapter 12。

因此，正如他在《論偶像崇拜》中反對兵役一樣，特土良在《論花環》中反對兵役的主要原因也是因為這會陷基督徒於偶像敬拜的處境中。然而，賴恩仍然堅持在其《論偶像崇拜》一書中，特土良終於顯示了他基本上「確實（就是一個）非戰主義者」，儘管我們認為其實他的這些論點是更傾向於類非戰主義（quasi-pacifism）而不是非戰主義。[23] 此外，有些非戰主義神學家也辯稱即便當時偶像崇拜並不盛行軍中，早期基督徒也是不會參與軍事服役的。尤達在反思這個立場時，堅持主張就算當時是一個「非偶像崇拜，非進行迫害的羅馬帝國……他們（基督徒）還是會（向軍事服役）說不的。」[24] 只是，這是一種過度簡化的觀點，正如科斯徹斯基（Koscheski）所駁斥的，那完全忽視這些原始文字的處境，即當時的基督徒確實在某種程度上認同了對羅馬帝國的軍事參與。[25]

三　俄利根

另一位常被引為非戰主義的支持者的早期基督徒作者就是俄利根。嚴格上來說，俄利根在教會的傳統中並沒有普遍的被承認為教父，主要因他的神學作品被認為有普救論之嫌。但這樣的指控有欠公平，因為他的主要原文作品、即希臘文作品，大都失傳，對他思想的評價都是借着後期拉丁翻譯本所得出的，而且並不影響他對戰爭倫理的看法。對於基督徒是否應該從軍的理解，俄利根在其《駁克里索》（*Contra Celsus*）第七卷裏，提出了對耶穌關於連左臉也轉過來由人打的理解。談到克里索指稱基督的這段教導乃是與舊約中「以眼還眼」的教訓相違背時，俄利根在接下來的一章中指出，讀者必須分辨舊約時代給猶太人的特許制度，及新約時代基督的教導。他的解釋是，舊約時代的猶太人乃構成了一個為生存而奮戰的國家，而且是一個神治的國家，有別於今天我們對「國家」的現代概念。因此，如果要他們遵隨新約的這個教導的話，

---

[23] Ryan, "The Rejection of Military Service by the Early Christians," 18.

[24] Yoder, *Christian Attitudes to War, Peace, and Revolution*, 47.

[25] Jonathan Koscheski, "The Earliest Christian War: Second- and Third-Century Martyrdom and the Creation of Cosmic Warriors," *Journal of Religious Ethics* 39:1 (2011): 104-5.

> 當敵人臨到他們時，將使他們遭到突然而徹底的毀滅；因為在那情況下，恰恰就是他們的律法禁止他們抵抗敵人。[26]

正如朗奇馬（Roukema）所留意到的，俄利根以舊約向克里索論證了耶利米哀歌三章30節也宣講轉過另一邊臉頰的教導，因此「以眼還眼」不是到新約才出現的一種新的教導。[27] 基督的教導，即連左臉也轉過來由人打，其用意乃是為以福音教導為依據且提出絕對不應該借用武力加以擴張屬靈國度，這與一種由國家批准的軍事參與應該區分出來。俄利根強調，舊約以色列准以發動戰爭的權力與如今關係到神屬靈國度的基督的命令，兩者之間並無衝突。因此，俄利根對於戰爭倫理的立場，乃取決於他認為基督徒所應該介入的戰爭類型——他認為基督徒應該參與戰事，但不是軍事戰爭，而是*屬靈戰爭*（spiritual warfare）。即便如此，卡多斯仍力爭俄利根還是可以被視為非戰主義者，因為他雖認識到戰爭是錯的，卻可以接受其中一方優於另一方，這乃是一種現實的非戰主義（realistic pacifism）。[28] 儘管如此，我們認為俄利根並不能算是真正的非戰主義者，因為他依然接受武力的運用，即便是以屬靈戰爭的形式出現。一如培登所描述的，俄利根甚至認為這場基督徒的屬靈戰爭將終末性的取代政治戰事。[29]

基於這樣一個認識，俄利根在後來在向克里索指稱不管是否有偶像崇拜包含其中，基督徒還是應該為羅馬和皇帝作戰此一說法作出的反駁中，就辯到基督徒實際上確實有為皇帝作戰，只不過是在屬靈的層面罷了：

> 克里索力勸我們盡全力協助國王……在他麾下作戰，或帶領一支軍隊與他並肩作戰。對此，我們的回應是：當有需要時，我們的確有給以國王協助，而且可以這麼說，是一種神聖的協助，穿上了神的全副軍裝。而我們這樣做乃是遵行了使徒的命令，因此，我勸你們，首先，

---

[26] 作者自譯。原著原文取自 Origen, "*Against Celsus*," in *Ante-Nicene Fathers,* vol 4, ed. P. Schaff (Peabody, MA: Henrickson Publishers, 1986), Book 7, Chapter 26。"This would be to subject them to sudden and utter destruction whenever the enemy fell upon them; for their very laws would in that case restrain them, and prevent them from resisting the enemy."

[27] Riemer Roukema, "Reception and Interpretation of Jesus' Teaching of Love for Enemies in Ancient Christianity," in *Violence in Ancient Christianity : Victims and Perpetrators*, eds. A. C. Geljon and R. Roukema, Supplements to Vigiliae Christianae (2014), 203.

[28] Cadoux, *The Early Christian Attitude to War*, 223.

[29] Bainton, *Christian Attitudes toward War and Peace*, 83.

> 要為眾人祈求、禱告、代求，和祝謝……任何人但凡越加敬虔，他所給予皇帝的協助就越加有效，甚至勝於那些在戰場上奮勇前進，殺敵無數的兵士。[30]

是以，俄利根能夠力稱基督徒確有為了皇帝而參與作戰，即便是在屬靈的層面上。而他也辯論說基於基督徒的敬虔，這屬靈層面的作戰甚至是更為有效的。至於基督徒得免提取兵器一事，他則指出有先例顯示羅馬諸宗教是允許祭司禁戒殺生的：

> 豈不知如你們所認為的某些神廟的祭司們，及那些服侍某些神祇的，都保持自己的雙手不染血腥，好讓他們以無玷污的、未沾人血的手把指定的祭物獻給你們的諸神；甚至即使兵臨城下，你們也從未招募祭司從軍。[31]

奇爾德雷斯（Childress）指出，俄利根在此似乎假設基督徒總是羅馬帝國的少數分子，否則他關於豁免基督徒攜帶兵器的訓示就難以理解了。[32] 另外，韋伯斯特（Webster）和科爾（Cole）也認為事實上，俄利根可以被理解為主張一方面基督徒祭司應該得以免除軍事服役，另一方面，一般的基督徒則可以服兵役。[33] 儘管如此，他們留意到大多數基督徒傳統選擇不在這一方面隨從俄利根的教導。由此看來，在戰爭的處境下，基督徒的任務就是為

---

[30] 作者自譯。原著原文取自 Origen, "*Against Celsus*," in *Ante-Nicene Fathers,* vol. 4, ed. P. Schaff (Peabody, MA: Henrickson Publishers, 1986), Book 8, Chapter 73。"Celsus urges us to help the king with all our might…to fight under him, or lead an army along with him. To this our answer is, that we do, when occasion requires, give help to kings, and that, so to say, a divine help, putting on the whole armor of God. And this we do in obedience to the injunction of the apostle, I exhort, therefore, that first of all, supplications, prayers, intercessions, and giving of thanks, be made for all men; for kings…the more any one excels in piety, the more effective help does he render to kings, even more than is given by soldiers, who go forth to fight and slay as many of the enemy as they can."

[31] 作者自譯。原著原文取自 Origen, "*Against Celsus*," in *Ante-Nicene Fathers,* vol. 4, ed. P. Schaff (Peabody, MA: Henrickson Publishers, 1986), Book 8, Chapter 73。"Do not those who are priests at certain shrines, and those who attend on certain gods, as you account them, keep their hands free from blood, that they may with hands unstained and free from human blood offer the appointed sacrifices to your gods; and even when war is upon you, you never enlist the priests in the army."

[32] Childress, "Moral Discourse About War in the Early Church," 10.

[33] Alexander F. C. Webster and Darrell Cole, *The Virtue of War : Reclaiming the Classic Christian Traditions East and West* (Salisbury, MA: Regina Orthodox Press, 2004), 196-97.

了皇帝的緣故，成立「一支特別部隊—— 一支敬虔的部隊——向神獻上我們的禱告。」[34] 按普雷茲（Praet）的說法，俄利根為關心帝國福祉這件事提出了一個強有力的示範：為它禱告並宣講愛。[35] 這樣的忠誠能表明在基督徒心中，他們是多麼地關心與捍衛羅馬帝國，因為他們的禱告「如同來自祭司」般上升到神那裏。[36]

故此，我們認為，儘管俄利根拒絕克里索關於基督徒應該為羅馬皇帝的緣故參與軍事的提案，他卻沒有否認戰爭事業或許是值得為之禱告，就表示戰爭本身可以是合理法的，即便參與戰爭並不適合他或其他基督徒，也因此粉碎了他是一個非戰主義者的假像，尤其是如果非戰主義者的一個基本要素是反對任何戰爭或反對任何參戰的話。鑒於俄利根所建議的「敬虔的部隊」，這裏出現一個清楚的跡象，顯示他乃容忍某種程度的軍事參與。然而，賴恩卻視俄利根為一「明確的非戰主義者」，儘管在同一段落的結尾處，俄利根已經承認他不贊成基督徒從軍的原因，根植於他對崇拜偶像的拒絕，而非對軍事參與的參與。[37] 梅吉溫（Megivern）也做出了相同的結論，儘管他也承認這是一種很奇特的非戰主義——並不拒絕戰爭本身，只是拒絕基督徒參與其間而已。[38]

除了認為基督徒僅僅是在屬靈層面而非實際層面上參與戰事才是合法的，俄利根反對基督徒加入軍隊的另一個可能原因或者與特土良一樣，即由於當時軍中盛行的皇帝敬拜。在《駁克里索》一書較早部分，俄利根堅決主

---

[34] 作者自譯。原著原文取自 Origen, "*Against Celsus*," in *Ante-Nicene Fathers,* vol 4, Book 8, Chapter 73。"A special army— an army of piety— by offering our prayers to God."

[35] Danny Praet, "Violence against Christians and Violence by Christians in the First Three Centuries: Direct Violence, Cultural Violence and the Debate About Christian Exclusiveness," in *Violence in Ancient Christianity : Victims and Perpetrators*, eds. A. C. Geljon and R. Roukema, Supplements to Vigiliae Christianae (2014), 47.

[36] 作者自譯。原著原文取自Origen, "*Against Celsus*," in *Ante-Nicene Fathers,* vol 4, Book 8, Chapter 74。 "Their prayers ascend to God as from priests".

[37] Ryan, "The Rejection of Military Service by the Early Christians," 20. 魯瑟也視俄利根非戰主義者。參Knut Willem Ruyter, "Pacifism and Military Service in the Early Church," *Cross Currents* 32:1 (1982): 61。

[38] James J. Megivern, "Early Christianity and Military Service," *Perspectives in Religious Studies* 12: 3 (1985): 179-80.

張基督徒「絕對不應該靠着皇帝的運勢起誓，也不應該靠着任何被視為與神相等的（事物）起誓。」[39] 這是根據新約教導所發出的明確禁令。因為「靠着皇帝的運勢起誓」可以指人將自己與皇帝的惡魔相聯結，而對此，俄利根這樣說道：「與其靠着邪惡奸詐的惡魔起誓，倒不如死了更好。」[40] 要不，就是指基督徒將自己與尚未存在的未知事件相接連。故此，這裏最重要的關注點並不是俄利根絕對反對參與兵役，而是當時參與兵役所涉及的一些通行的做法，意味着基督徒因為必須向皇帝宣誓忠誠而在道德上處於易受攻擊的地位。

四　亞歷山大的革利免

現在，我們來到早期教父相對看來較為次要的三個作品；次要非關其重要性，而在於它們在這個課題上相對簡潔扼要的評論。儘管簡略，亞歷山大的革利免卻是最早在著作中論及這個課題的教父之一。在他的《異教徒的勸勉》（*Exhortation to the Heathen*，約195年）中，他爭論說基督徒應當盡量在他所處的任何職業上克盡厥責，並常常為此感謝神：

> 我們說，你若是農夫的話就從事農業；但是當你耕地時，認識神。航行吧，你們致力航海的，然而同時呼籲那天上的導航者。當你在軍中服役時，知識是不是緊緊抓住了你？聽從那發出正確指揮的司令官吧！[41]

---

[39] 作者自譯。原著原文取自 Origen, "*Against Celsus*," in *Ante-Nicene Fathers,* vol 4, Chapter 8, Book 65。"Christians should never swear by the fortune of the king, nor by ought else that is considered equivalent to God."

[40] 作者自譯。原著原文取自Origen, "*Against Celsus*," in *Ante-Nicene Fathers,* vol 4, Chapter 8, Book 65。 "We must die sooner than swear by a wicked and treacherous demon."

[41] 作者自譯。原著原文取自 Clement of Alexandria, "*Exhortation to the Heathen*," in *Ante-Nicene Fathers,* vol 2, Chapter 10。"Practise husbandry, we say, if you are a husbandman; but while you till your fields, know God. Sail the sea, you who are devoted to navigation, yet call the while on the heavenly Pilot. Has knowledge taken hold of you while engaged in military service? Listen to the commander, who orders what is right."

乍看之下，革利免似乎支持基督徒參與軍事服役或者至少沒有堅決反對。然而，因為這裏並不十分清楚指明，一如他前面部分勸勉基督徒從事農耕事業與航海事業般，他似乎是要讓那些已經加入這些行業的基督徒繼續從事他們的工作，就像所留意到的。[42] 換言之，這裏並沒有明確指示基督徒要成為一名士兵，而是教導說如果一個人已經從軍而之後成為基督徒的話，那麼就繼續留在這行業中。在同一章較後的部分，革利免如此引用十誡：

> 如果你加入成為神的子民，天堂就是你的國家，神就是你的立法者。那麼是些甚麼法律呢？不可殺人。不可姦淫。[43]

既然革利免因為律法反對殺人就禁止基督徒取走人的性命，因此，原典的證據無法清楚告訴我們他是否無條件的支持軍中的服役。魯瑟把革利免在這裏的勸勉描述為基於保羅給予初期基督徒的指示，要他們「各人蒙召的時候怎樣，他就應當保持原來的情況。」（林前七20）[44] 若是如此，這就表示革利免當時主要是處理一個很特定的情況，但這也假設對他來說軍事服役在道德立場上是中立的情況，所以才會鼓勵那些服役軍中而歸信了的士兵繼續留在崗位上。借用韋伯斯特和科爾的一個例子，若革利免認為當兵會有任何引起異議的做法的話，他就不會要基督徒士兵聽從他的司令官了，正如他肯定不會勸誡一個妓女信主後致力地賣淫一樣。[45] 也因此，革利免充其量也不過是所謂早期教會非戰主義一個隱晦的見證罷了。

五　希玻律陀

活躍於第三世紀的首三十年，與特土良同屬一個時代的希玻律陀在他的《使徒傳統》（*The Apostolic Tradition*）為基督教戰爭倫理提出了一個更為明確的非戰主義：

---

[42] Alexander F. C. Webster and Darrell Cole, *The Virtue of War : Reclaiming the Classic Christian Traditions East and West* (Salisbury, MA: Regina Orthodox Press, 2004), 68-69.

[43] 作者自譯。原著原文取自 Clement of Alexandria, "*Exhortation to the Heathen*," in *Ante-Nicene Fathers,* vol 2, Chapter 10。"(I)f you enrol yourself as one of God's people, heaven is your country, God your lawgiver. And what are the laws? You shall not kill; you shall not commit adultery."

[44] Ruyter, "Pacifism and Military Service in the Early Church," 57.

[45] Alexander F. C. Webster and Darrell Cole, *The Virtue of War : Reclaiming the Classic Christian Traditions East and West* (Salisbury, MA: Regina Orthodox Press, 2004), 65.

> 凡擁有權柄的士兵，切不可殺人。若被命殺人，切不可執行任務，也不可發誓。但如果他不願意，就將他驅逐……如果一個初信者或忠實（的信徒）希望當兵的話，也將他（們）驅逐，因為他們鄙視神。[46]

這裏，希玻律陀列出了一連串的禁令。軍事人員不能執行死刑，儘管反對的原因並沒有明言，比如受刑者到底是一名戰俘或死囚，前設是他的讀者很清楚背後的原因。同樣的，一名初信者若是決定加入軍隊的話，就得因為他拒絕神的緣故被教會摒棄門外。因此，我們認為，儘管因為希玻律陀沒有加以展示他所處的狀況而不容易得出更多的結論，但相對於俄利根根據形勢加以定奪的較為細緻入微的做法，希氏有的是一股強大而不屈的非戰主義。賴恩也同樣概述說《使徒傳統》揭示了其作者的非戰主義，[47] 而卡多斯則總結這段文字的主旨乃在於一個士兵若是運用刀劍的強權的話，就無法進入教會。相同的，一名成為軍士的初信者則必須或放棄其職業，或面對被教會開除。[48]

六　拉克坦提烏斯

君士坦丁大帝之子的老師拉克坦提烏斯和希玻律陀一樣，於其《神聖教義》（*The Divine Institutes*）中也堅定地決定採取非戰主義的立場。他視戰爭為人類的道德災害，並這樣論道：

> 因為當神禁止我們殺人時，祂不僅只是禁止我們介入公開的暴力——這是連公法也不允許的——祂也警戒我們切勿接受那些被認為是合法做法的委託。由此，*一個正直的人從事戰爭就不合法*，因為他的戰役就是正義本身；或指控他人犯了死罪（也不合法），因為無論你以言

---

[46] 作者自譯。原著原文取自Paul F. Bradshaw, Maxwell E. Johnson, L. Edward Phillips, and Harold W. Attridge, *The Apostolic Tradition: A Commentary*, Hermeneia - a Critical and Historical Commentary on the Bible (Minneapolis, MN: Fortress Press, 2002), 88-90。 "A soldier who has authority let him not kill a man. If he is ordered, let him not go to the task nor let him swear. But if he is not willing, let him be cast out...A catechumen or faithful [person] if he wishes to become a soldier, let them [sic] be cast out because they despised God."

[47] Ryan, "The Rejection of Military Service by the Early Christians," 頁20.

[48] Cadoux, *The Early Christian Attitude to War*, 126.

> 語或刀劍置人於死地都沒有甚麼分別，因為所禁止的是置於死地這個做法。所以，關於神的這條戒律，理應是沒有例外可言的；將神定意使之成為聖的人置於死地，始終是非法的。[49]（斜體另加）

拉克坦提烏斯提出的反對任何形式的軍事參與，甚至死刑的主要原因，就是人生命的尊貴，且只有神有權力啟動戰事。培登認為這是反對基督徒參與戰役的清楚禁令。[50] 同樣的，奧爾尼斯指出拉克坦提烏斯的反對乃在於他認識到人具有無上的價值，他的殺戮將是對神的一種直接對抗，因此應該受到祂的全然譴責和定罪。[51] 梅吉溫同樣指出拉克坦提烏斯在《神聖教義》中的禁止殺戮是絕對而全面的，涵蓋了死刑與一切的戰爭。[52] 尤達也贊成拉克坦提烏斯在這裏的立場是一種明確的非戰主義，儘管他本身是執政體制中的要員之一。[53]

七　結論

本專文仔細審查了前尼西亞時代教父在戰爭倫理上的一些主要文獻，並達致兩個結論。首先，教父並沒有發展出一套統一的軍事參與倫理。這其實並不奇怪；鑑於作為一個運動開展起來的基督教，在首三個世紀乃以不同的速度在帝國蔓延開來，且取決於它是被接受或遭到逼迫，勢必在各地引起不同的回響。必須要等它在君士坦丁的時代裏迎來了一個安波羅修（Ambrose），特別是一個奧古斯丁才能為此一課題整理出一套系統性的

---

[49] 作者自譯。原著原文取自 Lactantius, "*The Divine Institutes*," in *Ante-Nicene Fathers,* vol 7, Book 6, Chapter 20。"For when God forbids us to kill, He not only prohibits us from open violence, which is not even allowed by the public laws, but He warns us against the commission of those things which are esteemed lawful among men. Thus it will be neither lawful for a just man to engage in warfare, since his warfare is justice itself, nor to accuse any one of a capital charge, because it makes no difference whether you put a man to death by word, or rather by the sword, since it is the act of putting to death itself which is prohibited. Therefore, with regard to this precept of God, there ought to be no exception at all; but that it is always unlawful to put to death a man, whom God willed to be a sacred animal."

[50] Bainton, *Christian Attitudes toward War and Peace,* 73.

[51] Hornus, *It Is Not Lawful for Me to Fight*, 115.

[52] Megivern, "Early Christianity and Military Service," 181.

[53] Yoder, *Christian Attitudes to War, Peace, and Revolution*, 54.

處理，而不是早期教父這類因應時局的作品。其次，教父們總體的觀點儘管多樣化，卻可以歸類為半非戰主義，或如戈里所 的——「類非戰主義」，而非現代意義的非戰主義。[54] 這表示他們或許痛恨任何殺戮與流血事件，他們卻也同時在不同程度下接受戰爭的合法性。賴恩也指出不應當自動假設那些拒絕流血事件的基督徒就一定會同時拒絕軍事服役或甚至死刑。[55] 因為和殺戮不同，聖經中並沒有清楚的禁令反對軍事服役，基督徒參軍在當時似乎是很普通的一件事，以致他們的出現並不特別值得一提。後來特土良與俄利根對基督徒參軍的非難，大部分源於其與異教信仰及皇帝崇拜的聯繫，而非任何道德理由。此外，亞歷山大的革利免對從軍的合法性雖表現得有些含糊，希玻律陀與拉克坦提烏斯則堅決反對軍事服役，儘管最終他們並沒有發展出一套清晰的神學架構以評價戰爭倫理。這項任務一直要到後來才由奧古斯丁於其作品中探討了正義戰爭的理論。綜上所述，在早期教父們的思想裏，教會裏仍然有基督徒士兵的一席之地。[56]

[54] Gorry, "Swords into Ploughshares?," 767.

[55] Ryan, "The Rejection of Military Service by the Early Christians," 28.

[56] Ryan, "The Rejection of Military Service by the Early Christians," 32.

撮　　要

本專文乃探討早期基督教教會對戰爭所持的態度，特別是君士坦丁時代之前的這段時期。此時期的看法日後被奧古斯丁（Augustine）倡導的正義戰爭（Just War）理論的卓越發展所取代，但本身仍具有其神學思想的價值。專文旨在發掘早期教會對軍事參與的回應的先行根源，尤其考慮到此一回應乃發生於「國家」的現代概念尚未成形以前。許多學者都聲稱儘管早期教會承認戰爭的合法性，但他們大體上均以非戰主義（pacifism）回應軍事參與，並堅決反對各種形式的軍國主義。本文將根據前尼西亞教父的作品，主張他們反對主要的理由大多出於牧養和倫理上的考量過於神學上的論說，而且當時整個情景是比一般所呈現的更為複雜與微妙的。雖然教父沒有嘗試為評價戰爭提出一個完整的神學和倫理架構——這任務日後將由安波羅修（Ambrose）與奧古斯丁加以承擔——早期的基督徒如特土良（Tertullian）、俄利根（Origen）、亞歷山大的革利免（Clement of Alexandria）、希玻律陀（Hippolytus）、拉克坦提烏斯（Lactantius）等誠然展示了以當時代處境為考量的形形色色的觀點，對我們今天的時代或也有所啟發。

ABSTRACT

The paper examines the attitudes of the early Christian church towards war, particularly in the pre-Constantinian age that was later superseded by the distinct development of Augustine's Just War theory. It seeks to uncover the antecedent roots of the church's response to war especially its attitudes to Christians joining the Roman army, taking into context that this took place before the modern concept of the state was developed. Most scholars have asserted that the early church registered a largely pacifist response and opposed militarism in all its forms even though it recognized the legitimacy of war. It will be argued, based on the writings of the Ante-Nicene church Fathers, that while their main reasons were not so much theological but rather pastoral and ethical, the picture is more complex and nuanced then has usually been presented. While the Fathers did not attempt to present a complete framework for the assessment of wars and Christians joining the army – a task that Ambrose and Augustine would undertake later – the early Christians, such as Tertullian, Origen, Clement of Rome, Hippolytus, and Lactantius, did display a diversity of views that took into account the circumstances of their day, and which may be instructive in our own times.